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及其启示

杨建刚

詹姆逊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著作等身,学术研究涉及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电影与科幻文学等多个领域,且在這些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正是在詹姆逊等人的大力推动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中成为显学,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2008年,被称为国际人文学科诺贝尔奖的挪威霍尔堡奖颁发给了詹姆逊,颁奖评语对其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詹姆逊自己所说的‘社会形式诗学’的研究中,他对理解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通过特定的文化客体把深刻的理论和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虽然詹姆逊总是以文学研究为基础,但他对文化研究、阐释学、建筑和后殖民理论以及美学、影视理论和历史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洞察。”⁽¹⁾“社会形式诗学”是詹姆逊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标识性概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代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这位伟大的文学理论家留给我们重要的理论遗产。

一、初识詹姆逊及其“社会形式诗学”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理论家有两个,一个是巴赫金,另一个是詹姆逊。不同于通过阅读作品而接受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我对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的接受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他本人的学术交往。21世纪初期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李西建教授攻读研究生的时候,时值后现代理论、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大放异彩,其中对众多青年学生最具吸引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家当属伊格尔顿和詹姆逊。伊格尔顿对青年学生的吸引主要基于他的教材《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而詹姆逊的影响则来自他的视野宏阔、富有理论穿透力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我正是在那一时期开始接触并阅读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等著作。在詹姆逊的著作中,这几本书相对而言比较通俗,译本语言也比较流畅,我在阅读过程中为詹姆逊旁征博引的写作风格和精辟的理论见解所折服,同时他所论述和提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也成了我继续阅读和学习的重要索引。但当时尚未考虑将詹姆逊作为自己未来的研究对象。在阅读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时,我被卢卡奇所说的“艺术中的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²⁾这个观点所吸引,从此开始带着对形式问题的关注来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2006年赴南京大学师从赵宪章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其间聆听了赵老师的“西方形式美学”课程,撰写了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观的论文《形式的革命与革命的形式》⁽³⁾,对卢卡奇的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基于此,我选择以“从对抗到对话——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关系史”为博士论文选题。为了推进论文写作,我认真阅读了《巴赫金全集》和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政治无意识》等著作。这些阅读积累奠定了我博士论文的基本框架。

读博期间,我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生计划资助,于2008年底赴美国杜克大学师从刘康教授学习。因为有詹姆逊教授坐镇,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被看作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圣地,也是中国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赴美访学的向往之地。我于圣诞节前夕到达杜克大学所在地达勒姆,时值杜克大学的春假,当时在杜克大学访学的朱国华教授帮我安排好了住宿并带我认识了多位中国访问学者之后便回国了。2009年元旦之后几天,杜克大学的春季学期就开学了。2009年春季学期,詹姆逊在比较文学系主讲研究生课程“尼采与后结构主义”。开学的第一节课,我便冒昧地走进了詹姆逊教授的课堂,坐在了教室后面。听课的美国学生大概有20多名,而前来旁听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就有近10名。初次

见到詹姆斯教授,他身材微胖,脸庞红润,头发稀疏,胡子拉碴,穿着米黄色的宽格子衬衣,灰色休闲裤,浅黑色运动鞋,提着一个装满书的白色布袋子,整体形象不修边幅,与我对美国学者西装革履、着装考究的想象完全不同。进入教室之后,看到如此多的中国人,詹姆斯教授并没有觉得奇怪,而是自顾自地讲起课来。与詹姆斯的博士生蒋洪生交流得知,詹姆斯近年来每次上课都是如此,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占据了教室后面的一排座椅。而杜克大学每年都有这么多的中国访问学者,与刘康教授的慷慨帮助有很大关系。在课堂上的讨论中,相对于美国学生的活跃讨论,中国学者虽然也有所介入,但整体上显得腼腆和沉默。虽然对他所讲的尼采、福柯、阿多诺、瓦格纳等理论家的学说也有所涉猎,但由于语言的障碍,以及詹姆斯讲课过程中的旁征博引,对我而言,聆听詹姆斯教授的课程还是有相当难度的。詹姆斯教授对中国学者是非常友好的,课间不断有人找他讨论问题,他都会耐心地回应和交流。

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为詹姆斯教授配备了一间比较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前面有个小套间,是其秘书工作的地方。想见到詹姆斯教授,要先与其秘书预约。开学几天后我便预约拜访了詹姆斯教授,得知我师从刘康教授,他非常热情,说刘老师是他的好朋友。我与他交流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告知他的思想是我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支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个学期我一节不落地听完了詹姆斯教授的课,课间与他就我的论文有过多次的简短讨论和交流。杜克访学一年,除了詹姆斯和刘康老师的课程之外,我还与何卫华、史岩林等一起聆听了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马克·汉森(Mark B.N. Hansen)、沃尔特·米格诺罗(Walter D. Mignolo)等教授的课程。听课之余,我便白天待在Perkins图书馆看书,晚上在宿舍翻译刘康老师的著作*Aesthetics and Marxism*⁽⁴⁾,该书是詹姆斯教授主编的“后当代介入”(Post-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s)丛书的一种。每翻译完一章就请刘老师审阅修订,刘老师的修改意见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的英文阅读和翻译水平。这就是我在杜克大学访学的第一个学期几乎全部的日常学习和工作。

2009年秋季学期,詹姆斯没有开设相关课程,见面的机会就变少了。詹姆斯邀请齐泽克访问杜克大学,做了两场讲座。不大的教室座无虚席,很多没有座位的同学就席地而坐,与在南京大学听齐泽克讲座时的情形别无二致。我也是慕名而去,听完讲座后与詹姆斯和齐泽克合影,遗憾的是后来因电脑故障,这些珍贵

的照片都遗失了。多次听刘康老师说起詹姆斯在乡间的家里养鸡养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蒋洪生也告诉我,詹姆斯家里的摆设比较简陋,他的书房里有一张趴在上面偶尔还会发出“咯吱咯吱”响声的老旧书桌,但詹姆斯对它却情有独钟,说这张书桌“极具生产性”,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前完成的。我很想找机会去詹姆斯家里拜访,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能实现,非常遗憾。在这个学期,我的工作重心转向仔细阅读詹姆斯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并撰写博士论文的相关章节。我每天上午从租住的公寓步行二十分钟到杜克大学Perkins图书馆宽敞的自习室读书,晚上再背着一包书回到公寓。詹姆斯的著作风晦涩、句式复杂,我只好把英文版与中译本对照阅读,从中也体会到了翻译詹姆斯著作之不易。此时,詹姆斯刚刚获得霍尔堡大奖,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网站上还挂着相关报道和获奖评语。获奖评语把詹姆斯的学术研究概括为“社会形式诗学”,对我启发很大。我把詹姆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主要是结构主义)对话的重要代表,以其“社会形式诗学”为抓手,撰写了《文本与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中的一个关键问题》⁽⁵⁾和《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吸收和借鉴——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实践》⁽⁶⁾两篇文章。前者分析了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对萨特的介入写作的反思、马歇雷和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和詹姆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以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对话关系。后者则以詹姆斯的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为个案,考察了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吸收和转化。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还有诸多问题不够明晰,所以希望在回国之前约詹姆斯教授进行一次访谈。通过邮件预约,得知詹姆斯在外地度春假,访谈难以实现。于是我就把准备好的访谈提纲发给了他,希望通过邮件进行访谈。也许被我的坚持打动,詹姆斯给了我面谈的机会。就在我即将回国的前两天,詹姆斯发来邮件,约我12月28日上午去他办公室交流。我与当时在杜克读书的师妹王弦按时赴约,围绕我准备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其间王弦也提了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詹姆斯都热情回应。访谈结束后,詹姆斯还十分慷慨地赠送给我我非常厚的新书*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中译本书名为《辩证法的效价》),并在扉页写了长长的祝福语。在朱国华教授的支持下,这篇访谈的英文原版最终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中文译本则收在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

与形式主义关系史》的附录中。2012年,北京大学开始主办国际学术大师讲座,詹姆逊受邀做第一讲,题目是《奇异性美学》(*The Aesthetics of Singularity*)。我从济南专程赶到北大聆听了讲座,吃饭期间与詹姆逊教授做了交流,并把收录访谈的那一期《文艺理论研究》送给了他。得益于这次访谈的深入交流,詹姆逊对王弦也有了很深的印象。王弦毕业后申请在美国读博士,詹姆逊为她写了一封高度评价的推荐信。2019年10月初刘康老师在杜克大学组织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工作坊,我有幸再次来到杜克大学。听刘康老师说,詹姆逊原定要来参加会议,但由于在外地没能及时返回,我也就错过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会议期间与朱国华、曾军等一起参观了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在詹姆逊的办公室门前拍照留念,并把随身携带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托刘康老师转交给他。没想到,这次错过变成了永别。

通过与詹姆逊的深入交往,以及对詹姆逊著作的阅读,我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已经深深地打上了詹姆逊的烙印。也正因为这样,我被国内学界看作詹姆逊的“门徒”。金永兵教授邀请我参与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撰写了詹姆逊的关键词“政治无意识”^[7];曾军教授主编最新版的教材《西方文论史》,邀请我撰写“新马克思主义”一节,其中詹姆逊的“绝对的历史主义”是核心内容之一。我也正在指导在读的研究生宋文婷以“詹姆逊文学批评中的历史化方法”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詹姆逊教授著作等身,遗憾的是,他的很多新著我尚未阅读。我相信,詹姆逊教授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思想和著作将继续存在于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长远时间里”(巴赫金语)。我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阅读詹姆逊的著作并研究他的思想,也将是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下面,我将对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的理论内涵及其启示意义进行简要阐释,以此表达对詹姆逊教授的缅怀和敬意。

二、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的理论内涵

“社会形式诗学”是对詹姆逊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总体概括,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詹姆逊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三部曲”(《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中试图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为其“社会形式诗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其后期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则是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詹姆逊的

“社会形式诗学”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包括如下多个方面。

(一)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美国涌现出了牛顿·阿尔文(Newton Arvin)、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工人日报》《党派评论》《解放者》等诸多左翼杂志,马克思主义成为美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流。但是,30年代之后美国政治急剧右转,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来自政府和财团的巨大压力,最终逐渐衰落。美国马克思主义与新批评之间的矛盾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矛盾非常相似,但其结局却恰恰相反,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压力之下最终消亡,新批评因符合右转政治的需求而得以快速发展,长期占据着美国文学批评的统治地位。直至60年代之后,新批评“作为一个威严而令人敬畏的父亲形象那样死去”^[8]。随着新批评的衰落,以及读者反应批评、符号学、原型批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潮的快速登场,美国文学理论开启了一场“向外转”运动。这一时期还比较年轻的詹姆逊通过向美国学界引介并深入研究当时在西欧炙手可热的德国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理论(结构主义)快速声名鹊起。正是在詹姆逊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已经被新批评所挤压而失去生存空间的40年后,在美国学术界再次占据了一席之地。詹姆逊以萨特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紧接着出版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评介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语言的牢笼》。1981年出版的《政治无意识》一书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原创作品,为他在美国学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执牛耳者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后期詹姆逊执教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从而使杜克大学成为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前沿阵地。

(二) 辩证综合的思维模式

詹姆逊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20世纪后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界,马克思主义是一条“无法超越的地平线”。但詹姆逊又不是一个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固守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学的只言片语,也不是信奉苏联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正如卢卡奇所主张的那样:“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又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

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照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侧重于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知识谱系相融合,从而发展出了不同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形态。詹姆逊在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辩证批评”的理论主张,甚至比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得更远。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采取更加开放的理论姿态,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点上辩证地吸收和综合当时知识市场上所流行的所有重要的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与众不同、得天独厚的思维模式”⁽¹⁰⁾,根本原因在于其理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相较于当时流行的其他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的优越性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兼容的批评操作,在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在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¹¹⁾。在他所吸收和综合的理论谱系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他的社会形式诗学和代表性概念“政治无意识”正是在对这九个流派进行辩证综合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¹²⁾

(三)“绝对的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

詹姆逊将建立在这种“辩证思维”基础上的文学批评称为“辩证文学批评”或“元评论”,其核心方法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通过对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卢卡奇和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分析,詹姆逊从中发现了一种“辩证思维”和“辩证文学批评”,认为“它们是一种时间形式,一个过程,一种对独特而确定的结构的实际经验”⁽¹³⁾。这种还稍显模糊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在随后的《语言的牢笼》中逐渐明晰。在这本著作中,詹姆逊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的历史主义”方法对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的思想进行了评述和批判。詹姆逊认为,形式主义者共时性方法带来了文学理论的范式革命,但是他们过多看重语言的共时结构而忽视其历时发展和意识形态内涵,这种反历史化倾向使结构主义陷入了“语言的牢笼”。因此,要超越形式主义,就必须为其增加一种历史的维度,并把它与社会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通过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深入分析和深刻批判,在《语言的牢笼》的结尾,詹姆逊提出,只有“通过揭示先在代码和先在模式的存在,通过重新强

调分析者本人的地位,把文本和分析方法一起让历史来检验……只有以此或以相类似的东西为代价,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些东西成对的、显然是无法比较的要求才能得到调和。”⁽¹⁴⁾也只有这样,结构主义才能打破这个“语言的牢笼”,使语言形式向历史开放,回归文学的意义层面和意识形态功能。

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姆逊对“绝对的历史主义”方法进行了全面阐发和批评实践。在“前言”一开篇,詹姆逊就明确指出:“总是历史化!这句口号——一句绝对的口号,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切辩证思想的‘超历史’的必要性,也将毫不奇怪地成为《政治无意识》的真谛。但是,正如传统的辩证法所教导我们的,历史化操作可以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运行,即客体的路线和主体的路线——事物本身的历史根源和我们试图借以理解那些事物的概念和范畴的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性,而最终只能殊途同归。”⁽¹⁵⁾詹姆逊将“客体的路线”与“主体的路线”加以综合运用,指出“绝对的历史主义”方法包含对立的两个视角,即文本的历史化和历史的文本化。其中,文本的历史化突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认为“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¹⁶⁾,任何抽空了文本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环境和评论家的历史环境的文学批评都不是辩证的和科学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用以阐释特定文本的参照,而且是所有阐释都不可回避的“绝对视域”。

(四)政治、历史与形式的三位一体

“绝对的历史主义”方法除了要求把文学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加以研究之外,还要求关注文学中的历史本身。受新历史主义影响,“绝对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历史的文本化,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¹⁷⁾文学家以叙事的方式使历史文本化,读者所接触到的也只是被文学所叙述的历史。克罗齐指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¹⁸⁾,任何历史叙述和研究的最终指向都是当下政治,关注历史只是关注政治的一种表征。因此,詹姆逊断言:“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¹⁹⁾可以看出,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政治和历史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只有具有政治指向的历史研究才是有价值的,同时也只有依据历史的政治批评才是深刻的。

然而,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而审美则是形式的。

文学艺术的政治和历史内涵都蕴含于艺术形式之中,并通过审美形式表现出来。文学的政治价值的实现也只有通过审美形式的中介才能够完成,而政治性在文学中的直接表现则是意识形态。可以说,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和形式是三位一体的。如其所言:“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我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到某种政治的判断。”⁽²⁰⁾ 语言和形式是文学的本体,对文学中的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必须以对文学语言的阅读、体验、感悟和分析为基础,因此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非常重视,尤其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和符号学情有独钟。他的《政治无意识》一书的理论基础就是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而他在后几章对巴尔扎克、吉辛和康拉德等作家的文学文本深层所包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信息的挖掘和阐释,就是借助了形式主义的语言和形式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他借助语言学家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对表达/内容与材料/形式之间关系的四分法,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区分为形式的内容、内容的内容、形式的形式、内容的形式四种类型,并把形式的内容作为其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主要对象。⁽²¹⁾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文学的形式往往与文学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相关,因此他提出了“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命题,并对伊格尔顿产生了重要影响。⁽²²⁾ 在之后的诸多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著述中,詹姆逊都采用了这种形式分析方法,尤其是借助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分析,通过对文学和文化文本的形式分析来挖掘社会结构深层的“政治无意识”。他把这种融通政治、历史与形式研究的方法概括为“社会形式诗学”,而且把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基本方法。甚至在他看来,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所做的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主义分析。⁽²³⁾ 显然,他的“社会形式诗学”就是对马克思的结构分析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三、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的学术启示

1985年詹姆逊受邀在北大开设一学期的课程“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开启了詹姆逊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思想的中国之旅。截至目前,除最近几年出版的新著之外,詹姆逊的主要著作和文集都已经翻译成中文。40年来,詹姆逊与中国学界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

系,被奉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泰山北斗。在杜克大学访学期间,曾有一位美国学生问我,美国有很多学术成就不亚于甚至超越詹姆逊的著名学者,你们中国学者为什么只对詹姆逊如此推崇?这当然不只是因为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更符合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学术立场,更重要的还是詹姆逊的理论学说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文学和文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契合性。近年来,刘康教授提出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詹姆逊就是他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个案之一。⁽²⁴⁾ 尽管在刘康看来,中国学界对詹姆逊的接受某种程度上带有“误读”的性质,从而产生了与詹姆逊的思想有所偏差的“詹姆逊主义”⁽²⁵⁾,但从萨义德的观点来看,这是理论旅行的必然结果,一种理论旅行到另一种文化语境中必然打上接受者的烙印而发生变异。⁽²⁶⁾ 换言之,“詹姆逊主义”的出现也从侧面证明詹姆逊的理论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深厚的应用潜力。无论如何,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放性及其吸纳其他知识谱系的能力

在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版图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与各种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最为复杂的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品格,从而具有极大的理论生产性和生命力。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而孕育出不同国别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能够吸收和借鉴其他知识谱系的有益成分而发展自己,从而发展出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正因为如此,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复数”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思想反映其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²⁷⁾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条“无法超越的地平线”,具有极强的理论渗透力,已经被诸如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法国激进左翼等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思潮所吸收和借鉴,从而成为它们的思想底色和贯穿其中的最大公约数。

作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已经度过了百年的建设历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诞生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样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本。但是 100 年来, 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本和重要理论命题并不多。新中国成立后, 对苏联文学理论的过度依赖, 使具有鲜明的日丹诺夫色彩的“苏联模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主导形态,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是其哲学基础, 无产阶级美学与资产阶级美学之间的斗争是其政治立场, 反映论是其理论核心命题, 政治批判是其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对苏联文学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 摒弃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苏联模式”及其“工具论”文艺观, 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学理论快速进入中国, 并引发了中国学者的研究热潮。甚至有学者担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已经被“西马化”。詹姆逊的文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进入中国并受到中国学界的热烈追捧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但是在文学理论方面, 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产生出许多能够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媲美、获得国际学界广泛认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流派、命题和话语。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入选《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是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被西方主流学界认可的一个实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结合还不够密切。因此,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 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 詹姆逊把源自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相结合的建构路径, 可以提供方法论借鉴。

(二)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相互生成

好的文学理论家往往都有自己钟情的作家作品, 也有大量的文学阅读经验和文学批评实践。俄国形式主义者之于果戈理和普希金、巴赫金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阿多诺之于贝克特、本雅明之于波德莱尔、德里达之于卢梭、热奈特和德曼之于普鲁斯特等, 莫不如此。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和狂欢化理论并不是直接产生于对历史上已有理论学说的直接综合, 而是基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小说的细致阅读和深入分析。詹姆逊的文学理论也是如此。早年撰写《萨特: 一种风格的起源》《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时, 他还处于对法国理论和德国理论的学习阶段, 所从事的是“元理论”研究。但是, 当这种元理论研究奠定了其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并为其提供了诸多

理论工具之后, 他便不再满足于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路径。自《政治无意识》开始, 他便把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政治无意识》的第一章, 他从理论层面提出了其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基本理念“文学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 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借用各种理论工具揭示蕴含在文本深层的“政治无意识”。在其后的几章中, 他通过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的作品分析, 实践了他在第一章中所提出的理论观念和批评方法。《政治无意识》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也为其后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之后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论现代主义》《未来考古学》等著作均采用这种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文艺学美学领域的思想活跃期, 很多并没有经过科班训练的青年学者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理论创造的热情, 勇于提出自己的理论学说, 很多人因此而声名鹊起、成名成家。然而, 随着中国文艺学从课程、教研室到目前逐步学科化的发展,⁽²⁸⁾ 这种情况悄然发生了改变。当前文艺学专业的课程教学、研究生培养, 很大程度上都成为理论自我生产。在文艺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 一般都是研究文学理论史上的流派和思潮、已有理论家的思想和学说, 或者其中衍生出来的文学理论问题, 难以像巴赫金和詹姆逊这样把理论问题与批评实践相结合, 并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提炼出自己的理论命题。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是因为对于青年学生来说, 提炼理论命题具有非常大的难度; 另一方面是因为建构一种不够完备乃至缺乏理论自洽的理论命题也可能会给自己的学位论文带来风险。因此, 研究已有理论就成为最保险的策略。长此以往, 中国文艺学领域的青年学者就失去了理论创造的勇气和能力, 理论自我生产也就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并试图摆脱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方式, 关注文学现实并努力建立自己的理论学说。因此, 像詹姆逊那样, 重新触摸文学, 从大量的文学阅读经验和批评实践中提炼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学说, 应该是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

(三) 重视文本细读和文学形式分析

一种主导性的文学理论生产和文学批评方式与文学教学之间往往是相互生成的关系。伊格尔顿发现, 当前英国的文学教授不再从事文学批评实践, 文学系的学生也不再对文学研究感兴趣, 反而转向了大众文化。这种转向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变迁使然,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根本没有受过系统的形式批评教育,

从而不具有关注文学形式的意识和进行形式分析的能力。文学专业的学生犯的最普遍的错误就是直接关注诗歌或小说说了些什么,而置它言说这些内容的方式于不顾。⁽²⁹⁾而在托多罗夫看来,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由于结构主义批评长期以来在法国文学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它所主张的文学观念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到了结构主义高潮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仍然“把文学作品设想为封闭自足而且绝对的语言之物”,并将此视为“神圣的公设”⁽³⁰⁾。分析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叙事技巧等形式因素是目前法国大学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以形式批评作为其核心能力的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在其毕业之后大多成为中学语文教师,从而将其所学的本领再次传递给高中生,这深深地影响了当今法国的高中文学教育。正如托多罗夫所言:“毫不奇怪,今天高中生所学的教条,就是说文学与世界其他事物没有瓜葛,他们只学习作品内在在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³¹⁾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为解决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文学的意识形态分析与形式批评之间的对立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与詹姆逊相互影响、惺惺相惜或“英雄所见略同”的伊格尔顿近年来也非常关注文学形式问题。与詹姆逊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相结合一样,伊格尔顿近年来重新回到文学研究中来,强调文本细读,并试图通过对形式主义的分析和借鉴来思考“马克思主义者到底该怎样读文学?”这一重要问题。他新近出版的《怎样读诗》(*How to Read a Poem*, 2007)和《怎样读文学》(*How to Read Literature*, 2013)这两部著作就是试图对这一问题提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正因为如此,伊格尔顿在给詹姆逊写的悼念文章中,对其“社会形式诗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坚信,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不能深入关注句子的形态,便无足轻重,而他自己则能够从一个叙述转折或诗歌语言的变化中,洞察出一整套意识形态策略。”⁽³²⁾

文学形式问题也曾一度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鲁迅等人就看到了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反对文言而提倡白话,把白话文学作为社会启蒙的重要途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群体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更是把文学形式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在瞿秋白看来,“五四式”欧化的白话仍然和以前的文言一样,还是士大夫的专享,而不是真正的工农大众的语言,老百姓仍然听不懂。要用文学来启蒙大众,就需要发起一场“俗话文学革命运动”⁽³³⁾。鼓励革命作家借鉴“旧形式”“真正的用俗语写一切文章”,这样才能创造出工农大众喜

闻乐见的“普罗文艺”。“文艺大众化”论争直接影响了之后的“民族形式”论争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形式的重视。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苏联文论的影响,关注文艺形式被看作资产阶级美学而受到批判。80年代之后,文学形式问题再次回到理论家的视野,文学形式本体论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命题。但是,伴随着当代西方文论和美学的影响和中国当代文化的变革,中国文学理论也快速向外转,文学形式问题再次旁落,形式分析也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短板。在对詹姆逊的接受中,中国学者也更多关注其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相对而言,对其所提倡的形式分析方法重视不够。因此,吸收和借鉴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可以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结 语

学术大师的死亡总是令人惋惜地感受到某一种理论或某一个时代的终结。詹姆逊曾在一次题为《德国批评传统》的演讲中不无遗憾地说,巴特、拉康、雅各布森、马尔库塞、萨特、阿尔都塞等一批理论家的相继离世,意味着“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³⁴⁾。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的开篇也同样充满悲伤地论断,随着巴特、福柯、德里达、阿尔都塞等一批法国理论家的去世,西方文学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³⁵⁾詹姆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的泰山北斗,和伊格尔顿被看作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双子星座。在当前的西方文学理论界,能够为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寥寥无几,后继乏人。2024年9月22日,詹姆逊去世了。剩下的伊格尔顿一下子变得势单力薄、孤掌难鸣。我们似乎也可以预言,詹姆逊的离世,即使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终结,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其理论高潮的衰退。这是时代的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的必然。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与体系建构”(项目编号:22JJD75003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王逢振:《詹姆逊荣获霍尔堡大奖》,《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

(2)[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 (3) 杨建刚:《形式的革命与革命的形式——俄国形式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之比较》,《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6期。
- (4) Liu Kang. *Aesthetics and Marxism: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该书中文译本《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 (5) 杨建刚:《文本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第1期。
- (6) 杨建刚:《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吸收和借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 (7) 杨建刚:《政治无意识:理论构成与阐释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 (8) [美]弗兰克·伦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王明丽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 (9)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页。
- (10)(20)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页,第7页。
- (11)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0, 又参见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8页。
- (12) 参见拙文《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吸收和借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和《政治无意识:理论构成与阐释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 (13)(27)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9页,序言第8页。
- (14)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朱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页。
- (15)(17)(19)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第58页,第4页。
- (16) Fredric Jameson, “Metacommentary”,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1: The Situation of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5.
- (18)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页。
- (21) Fredric Jameson, *The Modernist Papers*, London: Verso, 2007, p.xiv.
- (22) 杨建刚:《形式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及其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 (23) 杨建刚、王弦:《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 (24) 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南京师大学报》2019年第1期。
- (25) 刘康:《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詹姆逊与詹姆逊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 (26) [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0页。
- (28) 朱国华:《从课程、教研室到学科:文艺学的中国生产》,《上海大学学报》2023年第9期。
- (29) Terry Eagleton, *How to Read literat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3.
- (30)(31)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濒危的文学》,栾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第61页。
- (32) [英]伊格尔顿:《伊格尔顿忆杰姆逊》,《远读》公众号,2024年10月3日。
- (33) 史铁儿(瞿秋白):《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 (34) [美]詹明信:《德国批评传统》,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7页。
- (35)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李明彦)